



《文选》收录《毛诗序》探论

——兼论《文选》“序”文的收录标准

力之 阳欣

摘要:萧统编《文选》深受家族著述传统影响,其选入《毛诗序》并在《文选序》中直接称述其语,不但因为该序在经学上处于重要地位,也是因其在序体上的首创意义及其文学理论意义,可推《文选》编纂应受《毛诗序》的影响。且《文选》所收三篇经籍序等均为久负盛名的独立篇章,有近乎“论”体者,于当时文学深有影响。这表明昭明深具“篇什独立”的文学意识,也体现出其在选文上“动态”地对待不同文类的独特选编思想。《文选》把“序述”、“赞论”之类文体“各以汇聚”,“以类相从”,体现出缘起条贯、取类经典的特点,表明萧统亦具有文学发展的观念及文体溯源的意识。

关键词:《文选》;《毛诗序》;萧统;序体;收录标准

DOI: 10.13734/j.cnki.1000-5315.2024.0602

收稿日期:2023-04-10

基金项目: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《文选》五臣李善二家注论衡”(19BZW061)、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“《诗经》叙事性研究”(XYCBZ2019002)的研究成果。

作者简介:力之,男,广西北海人,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E-mail: liuhanzhong@126.com;

阳欣,男,广西灵川人,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,副编审。

萧统《文选》“序”类收录了九篇独立序文,即卜子夏《毛诗序》^①、孔安国《尚书序》、杜预《春秋左氏传序》、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、石崇《思归引序》、陆机《豪士赋序》、颜延之《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》、王融《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》、任昉《王文宪集序》。除了收录上述九篇序文外,尚有附于作品正文的作者自撰之序,如班固《两都赋序》、左思《三都赋序》等,又有《文选》编者“摘史辞以为序”之类。对于上述序类,近来学者多有关注并有相关论著讨论^②。然对于《文选》所录之《毛诗序》、《尚书序》、《春秋左氏传序》等三篇经籍序,学界却少有专论究之。目前所见之专题论文有新竹清华大学朱晓海先生《〈文选〉所收三篇经学传注序探微》一篇,朱先生以为三篇经籍序之所以入《选》,“恐怕不是因为作品本身有何朱紫宫商之成就,或可资后进取法之处,也不是因为它们在该文类发展史上有何里程碑的地位,乃是因为在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,作《春秋》这集体记忆中,经生对那些经传取材、编撰方式、目的等方面的阐释,以及研读学术史的评述,可供这选编比附,并藉此补充了《〈文选〉序》不便明言的部分”^③,即认为三篇经籍序作者子夏、孔安国、杜预等并非以文章名世,此三篇序文能入《文选》,乃经学传统的力量使然。其结论似有可商之处,故本文不揣浅陋,就《文选》与《毛诗序》之关系及其收录序文之标准,略陈管见,以求教于大方之家。

① 本文不讨论《毛诗序》的作者问题。

② 学界已有多篇专题论文及相关著作讨论《文选》序类,参见:唐普《〈文选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考证》,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2年第3期,第60—64页;力之《关于〈文选〉“摘史辞以为序”之是非问题》,《古典文献研究》2010年第13辑,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,第92—107页;胡大雷《〈文选〉编纂研究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;李乃龙《〈文选〉文研究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;等等。

③ 朱晓海《〈文选〉所收三篇经学传注序探微》,《中国文论的方与圆——古代文学理论研究(第三十一辑)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35页。

一 梁代《毛诗》之学对萧统的影响

一般来说,文学选集往往与选家的学养背景有关。故欲考察《文选》与《毛诗序》之关系,不得不考论萧统家学传统及梁代《毛诗》之学的影响。自孔子制六经传之后世,后代学者著述立言以期不朽,渐成为儒家传统事功之一。汉代以来,司马相如等辞人作赋,史迁、班氏著史,刘向、刘歆父子录书,贾、马注经等,莫不如是。儒家著述传统延至后代,亦为帝王所重视并亲身倡导。在中国历史上有帝王之尊而以“文学”著称的家族,当首推魏氏“三曹”,其次当推梁代萧衍与萧统、萧纲、萧绎父子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云:“创业之君,兼擅才学,曹魏父子,固已旷绝百代,其次则齐、梁二朝,亦不可及也。”“至萧梁父子间,尤为独擅千古。”^①曹氏父子以诗赋著称,而萧氏父子则以著述闻名。故我们考察《文选》的编辑情况,不能不考论其著述传统及当时风气的影响。

据《梁书》记载,梁武帝萧衍“少而笃学,洞达儒玄。虽万机多务,犹卷不辍手,燃烛侧光,常至戊夜。造《制旨孝经义》,《周易讲疏》,及六十四卦、二《系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等义,《乐社义》,《毛诗答问》,《春秋答问》,《尚书大义》,《中庸讲疏》,《孔子正言》,《老子讲疏》,凡二百余卷”,“历观古昔帝王人君,恭俭庄敬,艺能博学,罕或有焉”^②。武帝诸子亦多有著述。太子萧统“所著文集二十卷;又撰古今典故文言,为《正序》十卷;五言诗之善者,为《文章英华》二十卷;《文选》三十卷”^③。简文帝萧纲有《礼大义》二十卷、《老子义》二十卷、《庄子义》二十卷等。元帝萧绎有《周易讲疏》十卷、《老子讲疏》四卷等。可谓一门擅文,人均有集。萧统编辑《文选》虽与梁武帝无直接关系^④,但《文选》的编辑成书,其受家族著述传统及时代风气的影响,则在情理之中。

从梁代《诗》学来看,《毛诗》之学对萧统应有不小的影响。就梁代《诗》学著述而言,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(以下简称“《隋志》”)经部《诗》类可知,梁武帝著有《毛诗发题序义》、《毛诗大义》,萧统之弟萧纲著有《毛诗十五国风义》^⑤。除了上述武帝父子之作外,其时朝野之中有关《毛诗》的著作尚不少,如桂州刺史崔灵恩《集注毛诗》二十四卷,“隐居先生”陶弘景注《毛诗序》一卷,给事郎谢县济《毛诗检漏义》二卷,处士何胤撰《毛诗总集》六卷、《毛诗隐义》十卷,等等^⑥。可见《毛诗》为梁代君臣所共同重视,由此又可窥见帝王爱好对当时风气的影响。《毛诗》在三国之后颇为流行,有关这方面的著述颇多,主要集中于三国、晋、宋与梁,而尤以梁为盛。《隋志》云:“《齐诗》,魏代已亡;《鲁诗》亡于西晋;《韩诗》虽存,无传之者。唯《毛诗郑笺》,至今独立。”^⑦《毛诗》在梁代为《诗经》最主要的学派。据《隋志》著录,由汉流传至隋有关《诗经》的著作多达40余种,其中有36种为《毛诗》著作。而《隋志》小注说明已亡佚的《毛诗》著作,又多以梁代为据。按《隋志》所载,明确见于梁代而至隋已亡者多达30余种,如其所录,梁代有汉贾逵《毛诗杂议难》十卷,马融注《毛诗》十卷,郑玄、王肃合著《毛诗》二十卷,三国魏王基《毛诗驳》五卷,晋陈统《毛诗表隐》二卷,徐邈等撰《毛诗音》十六卷,宋徐广《毛诗背隐义》二卷,杨义《毛诗杂义》五卷,雷次宗《毛诗义》二卷,齐刘瓛《毛诗篇次义》一卷,佚名《毛诗图》三卷,等等^⑧。由梁代《诗》学著述及前代《诗》学著作在梁代的流传情况,可见《毛诗》在当时的流传盛况及其崇尚《毛诗》之学的风气。史载萧统博学多览,相关文献亦时有此说者,如萧统《昭明太子集序》云:“研经博学,手不释卷。”“群玉名记,洛阳素简,西周东观之遗文,刑名儒墨之要旨,莫不殚兹闻见,竭彼绵绵。”^⑨据此推测,萧统对以上梁代流传的《毛诗》著述,理应有所涉猎。

其实,《诗经》亦为萧氏家学之一。据史书记载,西汉之时萧氏家族就有《诗经》之学,其祖萧望之曾治《齐诗》^⑩。班固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云:“至望之,好学,治《齐诗》,事同县后仓且十年。以令诣太常受业,复事同学博士白奇,又从夏侯胜问《论语》、《礼服》。京师诸儒称述焉。”^⑪又《汉书·眭两夏侯京翼李传》云:“翼奉……治《齐诗》,

①赵翼著、王树民校证《廿二史札记校证》,中华书局2013年版,第261、262—263页。

②姚思廉《梁书》,中华书局1973年版,第1册,第96、97页。

③姚思廉《梁书》,第1册,第171页。

④周春艳《非因立场游离、武帝影响与萧统心境变化所致——〈《文选序》与《文选》差异问题的再审视〉辨证》,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0年第1期,第108—114页。

⑤魏徵《隋书》,第4册,中华书局1973年版,第917页。

⑥魏徵《隋书》,第4册,第916—917页。

⑦魏徵《隋书》,第4册,第918页。

⑧魏徵《隋书》,第4册,第916—917页。

⑨萧统著、俞绍初校注《昭明太子集校注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第250页。

⑩《梁书·武帝本纪》:“高祖武皇帝萧衍……汉相国何之后也。何生鄴定侯延,延生侍中彪,彪生公府掾章,章生皓,皓生仰,仰生太子太傅望之……”参见:姚思廉《梁书》,第1册,第1页。

⑪班固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0册,第3271页。

与萧望之、匡衡同师。三人经术皆明，衡为后进，望之施之政事……”^①可见其祖已有《诗》学传统，武帝及其子皆习《毛诗》并有著述，自有其家学渊源。沈约《武帝集序》称颂武帝“爰始贵游，笃志经术，究淹中之雅旨，尽曲台之奥义，莫不因流极源，披条振藻；若前疑往滞，旧学罕通，而超然直诣，妙拔终古；善发谈端，精于持论，置垒难逾，推锋莫拟”^②。武帝于《诗》学可谓集大成者，如前揭《隋志》所录，其著有《毛诗发题序义》、《毛诗大义》。《梁书·简文帝本纪》亦云：“高祖所制《五经讲疏》，（简文帝）尝于玄圃奉述，听者倾朝野。”^③武帝所制《五经讲疏》之中，自当有《毛诗》讲疏。其《毛诗答问》、《毛诗发题序义》、《毛诗大义》等著作是否为《五经讲疏》的内容之一，无据可查，但武帝深于《诗》学，应是确定无疑的。武帝诸子也自幼学习《毛诗》，萧纲于《诗》学早有所成。《梁书·简文帝本纪》云：“（简文帝）雅好题诗，其序云：‘余七岁有诗癖，长而不倦。’然伤于轻艳，当时号曰‘宫体’。”^④按，七岁之“诗癖”，应与宫体无关，或应是自幼诵习《诗经》之意。萧纲作《毛诗十五国风义》，应受传统家学的影响。《毛诗十五国风义》注《陈风》“歌以讯之”有云：“诗者，思也，辞也，发虑在心谓之思，见其怀抱者也。在辞为诗，在乐为歌，其本一也。故云‘作好歌以讯之’。”^⑤又可见其已摆脱传统《毛诗》之说而有新解。唐代学者成伯瑜《毛诗指说》特引之以为说^⑥，可视为唐宋疑诗风气之先导。

由上可见，萧氏父子于《诗》学皆有成就，应受家学传统及时代风气影响，同时又以帝王之尊，引领当时社会风尚。在梁代君臣特别是武帝尤重《诗》学的环境下，萧统自然深受熏陶。萧统两岁被武帝立为太子，自幼以儒家思想加以培养。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云：“太子生而聪睿，三岁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五岁遍读《五经》，悉能讽诵。”^⑦《五经》之中最适合讽诵者当属《诗经》，萧统自幼遍读《五经》，悉能讽诵，可见其儿时对《诗经》的熟习程度。及其长，“读书数行并下，过目皆忆。每游宴祖道，赋诗至十数韵。或命作剧韵赋之，皆属思便成，无所点易”^⑧，可知其于《诗》学亦应有成。在萧统诗文中多有引用《诗经》之作。如《示徐州弟》诗十二首，为昭明赠时任徐州刺史的晋南王萧纲的四言组诗，其中多有《诗》典，更像是兄弟间交流《诗》学心得的习作。如组诗其三“绸缪”一语出自《唐风·绸缪》“绸缪束薪”；其四“行迈”一语出自《王风·黍离》“行迈靡靡”；其六“有命自天”、“滔滔不归”两句分别出自《大雅·大明》和《豳风·东山》；其七“我心则夷”则出于《召南·草虫》；其八“四始”出于《毛诗序》，“旨酒”出于《小雅·鹿鸣》“我有旨酒”；其十“维城”出于《大雅·大板》“宗子维城”，“朝饥”出于《召南·汝坟》“怒如调饥”；其十一“远于将之”出自《邶风·燕燕》；其十二“玉颜虽阻，金相嗣丘”出于《大雅·棫樸》之“金玉其相”^⑨，等等。该组诗引用《诗经》典故丰富多彩、自然浑成，表明萧统对《诗经》非常精通和熟悉。萧氏又有《孝经》之学。据《隋志》载：“《孝经义疏》十八卷。”注云“梁武帝撰。梁有皇太子讲《孝经》三卷，天监八年皇太子讲《孝经》一卷”^⑩。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载：“（天监）八年九月，于寿安殿讲《孝经》，尽通大义。讲毕，亲临释奠于国学。”^⑪按儒家子弟入学受经的顺序，大概先读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以后逐渐读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，昭明三岁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五岁遍读五经，十岁能讲《孝经》，以昭明太子“生而聪睿”之质及学习进度，亦可推见昭明《诗》学程度亦当匪浅。

综上，儒家经学及著述传统对萧统深有影响，且萧氏父子自身经学根柢深厚，于《诗》学皆有所成，可推知萧统编《文选》应受其家学影响。然传统观点多以为，《文选》不选“姬公之籍、孔父之书”等传统经典，是“文学”独立于经学的标志。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扬鸿烈、家雁（李嘉言）、骆鸿凯等学者赞同阮元所提出的“沉思翰藻”之说，认为萧统不选经史子类，是有意区分文学与非文学。这种观点在60至80年代又得以发扬，郭绍虞、王运熙等学

①班固《汉书》，第10册，第3167页。

②欧阳询撰、汪绍楹校《艺文类聚》卷14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，第269页。

③姚思廉《梁书》，第1册，第109页。

④姚思廉《梁书》，第1册，第109页。

⑤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卷16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20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81页。

⑥成伯瑜《毛诗指说》“解说第二”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冠山堂本。

⑦姚思廉《梁书》，第1册，第165页。

⑧姚思廉《梁书》，第1册，第166页。

⑨萧统著、俞绍初校注《昭明太子集校注》，第22—24页。

⑩魏徵《隋书》，第4册，第934页。

⑪姚思廉《梁书》，第1册，第165页。据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载，昭明性仁至孝，其母丁贵妃去世，哀毁过度，口不进食，体围减削过半，见者“莫不下泣”，以至于武帝下旨强进饮食。由此可见，萧统深受儒学及孝道影响。

者皆有论述,对学界产生较大影响^①。萧统《文选》收录《毛诗序》等三篇经籍序,是否如前揭朱晓海先生所言,不是因为“作品本身有何朱紫宫商之成就,或可资后进取法之处,也不是因为它们在该文类发展史上有何里程碑的地位”,乃是源于经学传统的力量?以下试析之。

二 《毛诗序》对萧统《文选》编纂的影响

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云:“(萧统)恒自讨论篇籍,或与学士商榷古今;闲则继以文章著述,率以为常。”^②据此,可知昭明编纂《文选》基于其平素深厚的学养,亦可知《文选》为深思熟虑之作,而绝非仓促成书者^③。《毛诗序》对萧统编《文选》有何影响,史无明载,但仍可从《文选》考而论之。就《文选序》看,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文体上,都有源于《毛诗序》者。可以说,《文选》之所以收录《毛诗序》,不但因其在经学上的重要地位,也因其在序体发展历史上的首创地位及其文学理论方面的意义。

首先,从《文选序》来看,其中有两处直接引述《毛诗序》之语,特别标明“六义”、“诗言志”以及“四始”、“风雅”之意,可见萧统深受《毛诗序》诗学思想的影响。

其一,以“六义”评论赋体:“《诗序》云:‘诗有六义焉:一曰风,二曰赋,三曰比,四曰兴,五曰雅,六曰颂。’至于今之作者,异乎古昔,古诗之体,今则全取赋名。荀宋表之于前,贾马继之于末,自兹以降,源流实繁。”^④萧统在此标明“六义”,是以其为标准衡量古今赋体并评论今之作者:“至于今之作者,异乎古昔。古诗之体,今则全取赋名。”近人刘咸忻《〈文选·序〉说》云:“《序》先论《诗》,而举六义,明乎词赋一流,皆源六义。又曰:古诗之体,今则全取赋名。此言后世之赋,以附庸而成大国,兼该六义,足以当古之诗也。”^⑤此可谓得其大者矣。

其二,以“诗言志”综论诗、赋等各种文体,标明“风雅”之义:“诗者,盖志之所之也,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,正始之道著;桑间、濮上,亡国之音表。故《风》、《雅》之道,粲然可观。自炎汉中叶,厥涂渐异。”^⑥继而论汉以来诗、赋之变及箴、戒、论、铭、诔、赞等各种文体的兴起,并总其辞云:“众制锋起,源流间出。譬陶匏异器,并为入耳之娱;黼黻不同,俱为悦目之玩。作者之致,盖云备矣!”长期以来,人们多据序中“入耳之娱”、“悦目之玩”之语,而认为萧统视文学为“娱情悦目”之事,并以为其推崇文学的“娱乐”作用。然昭明身为储君,亦肩负体国经制之责,自然不能以普通人之“娱情悦目”视之。在《文选序》中,昭明虽称“监抚余闲,居多暇日”,似表明其编《文选》只是业余爱好,然文章为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^⑦,其称“监抚”,不正表明其在“暇日”仍不忘“监抚”之职吗?因之,“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,正始之道著;桑间、濮上,亡国之音表。故《风》、《雅》之道,粲然可观。自炎汉中叶,厥涂渐异”,“自姬汉以来,眇焉悠邈,时更七代,数逾千祀,词人才子,则名溢于缥囊。飞文染翰,则卷盈乎湘帙”云云,实寓有批评和不满,故萧统欲“略其芜秽,集其清英”,将“文”之精华编入《文选》。此亦《文选》编纂之由也。

类似上述的对东汉以来文学风气的批评,亦见于稍早之与萧统“同志”者。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云:“而后之作者,采滥忽真,远弃风雅,近师辞赋,故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。”^⑧刘勰作《文心雕龙》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的文风,对《文选》虽无直接影响,但二者文学思想有一定相通之处。在萧统等人看来,东汉以来文章以词藻为能事,偏于“文”而疏于“志”,如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评“近代”之文学云:“俪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,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穷力而追新,此近世之所竞也。”^⑨而“风雅”、“比兴”正是救治文风浮华弊病的良药。故昭明不但直

①参见:王立群《现代〈文选〉学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,第139—171页。20世纪80年代末,王运熙先生对传统观点进行了反思,指出:“过去有的同志在评论萧统时,认为《文选》不选经、史、子三部的篇章,是说明编者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区别开来,表明了当时人们文学观念的明确和进步。我过去也有这种看法。现在看来,这种说法并不确切。”参见:王运熙《〈文选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》,《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88年第6期,第11—12页。

②姚思廉《梁书》,第1册,第167页。

③参见:力之《关于〈文选序〉与〈文选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——兼论〈文选〉非仓卒而成及其〈序〉非出自异手》,《文学评论》2002年第2期,第138—144页。

④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第1册,《文选序》第1页。按,以下所引《文选序》文字皆出于本书该序(第1—3页),不复标注。

⑤刘咸忻《推十书》(增补全本),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,戊辑,第1册,第21页。

⑥萧统所引与《毛诗序》略有不同,然这不是问题。参见: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卷12“古人引用经子语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第176—177页);清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卷3“古人引书每有增减例”(俞樾等著《古书疑义举例五种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46—48页)等。

⑦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,第6册,第2271页。

⑧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,第538页。

⑨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67页。

接征引《毛诗序》“诗言志”表述,而且隐括《毛诗序》“正始”、“风雅”的观念,以之作为评论自汉代以来各体文章的准的。在昭明看来,所谓“入目之娱”、“悦目之玩”不过是当时文学审美的基本要求,如其所云“作者之致,盖云备矣”。而真正有意义的文学,必须“文质彬彬”而有“君子之致”,如其《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》所云:“夫文典则累野,丽亦伤浮,能丽而不浮,典而不野,文质彬彬,有君子之致。”^①可见,萧统虽推崇“典丽”等文学审美风格,亦有主张“文质彬彬”、“文质相符”的一面,这与《文心雕龙》追求文雅典丽的文学思想亦有一定相合之处。

在前代诗人之中,萧统特喜左思和陶渊明。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载:“(昭明)性爱山水,于玄圃穿筑,更立亭馆,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。尝泛舟后池,番禺侯轨盛称‘此中宜奏女乐’。太子不答,咏左思《招隐诗》曰:‘何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。’侯惭而止。”^②在《文选》中,萧统录左思《咏史诗》八首、《招隐诗》二首、《杂诗》一首,又录其《三都赋》与自序及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,可见左思诗文尤为昭明所喜爱。又,萧统《陶渊明集序》云:“余爱嗜其文,不能释手,尚想其德,恨不同时。故加搜校,粗为区目。白璧微瑕,惟在《闲情》一赋。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,卒无讽谏,何足摇其笔端?惜哉,亡是可也!……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,驰竞之情遣,鄙吝之意祛,贪夫可以廉,懦夫可以立。岂止仁义可蹈,抑乃爵禄可辞。不必傍游泰华,远求柱史,此亦有助于风教也。”^③《毛诗序》云:“风,风也,教也。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。”^④可见,萧统以“风教”观评论陶集,本之于《毛诗序》风教之说,故《闲情赋》未能收入《文选》,除“价值取向”之差异外^⑤,其与萧统“风教”及“雅正”思想亦当不无关系。另外,左思《咏史》诗所体现的诗学风格被钟嵘《诗品》称为“左思风力”,陶渊明诗则被《诗品》称为“文体省净,殆无长语。笃意真古,辞兴婉惬。每观其文,想其人德。世叹其质直”^⑥。上述“风力”、“真古”、“质直”云云,皆与古《诗》风格相类,由此可见萧统的文学偏好。

由是观《文选》未收之文,多与陶渊明《闲情赋》类似,概因其不能符合“雅正”之故。如最为著名的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,其文固然批判老庄“一生死”、“齐彭殤”的思想,然其认为人生短暂及时行乐,应随世以俯仰,极视听以娱情,仍可谓之消极,与儒家“言志”、“雅正”思想不符,故昭明不收,理所当然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评各“言不持正”之文章:“至如张衡《讥世》,韵似俳说;孔融《孝廉》,但谈嘲戏;曹植《辨道》,体同书抄;言不持正,论如其已。”^⑦其“言不持正”云云,概指上述文章不能遵循儒家正统思想,或亦因此不为昭明所收。《文选》所收之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评孔融云:“体气高妙,有过人者,然不能持论,理不胜词,以至乎杂以嘲戏,及其所善,杨班俦也。”又云:“盖奏议宜雅,书论宜理,铭诔尚实,诗赋欲丽。”^⑧其中所反映的文章“雅正”观念,亦与《文选》近同。这表明在“近世”文风“衰弱”之时,萧统等人欲纠其偏向,故特隐括《毛诗序》之义,重倡“诗言志”,标明“六义”、“风雅”,主张“文质并重”。由此可推知,萧统之编《文选》,其在价值取向上受到《毛诗序》的影响。

三 《毛诗序》等“篇章独立”与《文选》“序”文的收录标准

萧统在《文选序》中云:“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,序述之错比文华,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,故与夫篇什,杂而集之。”历来论者多以“综缉辞采,错比文华,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作为“序述”、“赞论”之类文体的选取标准,然就《毛诗序》、《尚书序》、《春秋左氏传序》三篇经籍序而言,三篇序文本为附经之作,皆祖述经伦,文风质朴,与“综缉辞采,错比文华”相去甚远,似不合于“沉思翰藻”的标准,如明人孙矿(号月峰)评《毛诗序》云:“平淡之极。昭明最尚组绘,却乃取此等,岂以其名故耶?”^⑨即认为《文选》选录标准不一,或以此为昭明文学理论与编辑实践之矛盾。如上所述,朱晓海先生《〈文选〉所收三篇经学传注序探微》一文认为三篇经籍序之所以入《选》,主要源于儒家经学传统的力量,如朱先生所言“‘姬公之籍、孔父之书’被驱出文学园地,势必另铸神龛,将奉入者经典化,以为

① 萧统著、俞绍初校注《昭明太子集校注》,第155页。按:当然,这里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更具“自我”色彩,而《文选序》所呈现的或有某种程度上的“共识”成分。不过,就主要倾向而言,二者应是相一致的。

② 姚思廉《梁书》,第1册,第168页。

③ 萧统著、俞绍初校注《昭明太子集校注》,第200—201页。

④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陆德明音义、孔祥军点校《毛诗传笺》,中华书局2018年版,第1页。

⑤ 参见:力之《〈闲情赋〉之评价种种》,力之《〈楚辞〉与中古文献考说》,巴蜀书社2005年版,第347—360页。

⑥ 钟嵘著、陈延杰注《诗品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,第41页。

⑦ 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327—328页。

⑧ 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,第6册,第2271页。

⑨ 许逸民《清代文学学名著集成》,广陵书社2013年版,第5册,第222页。

‘准式’……然而传统观念力量之大,萧氏父子岂容不知?是以仍须乞灵于被逐出的旧神明”^①。朱先生言下之意,乃认为萧统欲借传统经学的影响力以自重。然《毛诗序》等如朱先生所言如此不重要,昭明又如何借之以自重呢?而且,此三篇经籍序于当时不为时人所重,并不代表后代亦然。我们联系前述梁代之《诗》学风尚,以及《文选序》直接征引《毛诗序》、《尚书序》中文字,恰说明三篇序文为梁代学者特别是昭明太子所重视。

萧统在《文选序》中说得很清楚,《文选》之所以不选儒家经典,是因为“姬公之籍,孔父之书”等儒家经典“与日月俱悬,鬼神争奥,孝敬之准式,人伦之师友,岂可重以芟夷,加之剪截”,即是为了保持经典的完整和原貌。《文选》于《诗经》等经典一篇不取而独取其序文,并非要把四言古诗之类逐出“文”的领域,而是因经典不可芟夷剪截。三篇经籍序文的入选与不选经典,两者本无逻辑上的矛盾。而且,当时经学与文学并非截然两分,二者之间亦无后代所谓彼此对立的关系,这从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等篇也可得到证明。萧统在《序》中也清楚地表明:“自炎汉中叶,厥途渐异;退傅有‘在邹’之作,降将著‘河梁’之篇;四言五言,区以别矣。又少则三字,多则九言,各体互兴,分镳并驱。”即四言诗至五言诗的演变,是文体继承与发展的关系,而非对立和冲突的关系。《文选序》又云:“文之时义远矣哉!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,大辂宁有椎轮之质;增冰为积水所成,积水曾微增冰之凜。何哉?盖踵其事而增华,变其本而加厉;物既有之,文亦宜然。随时变改,难可详悉。”其中“各体互兴,分镳并驱”及“踵事增华”、“变本加厉”云云,表明萧统对文体发展有清楚的认识。三篇序文入选,亦应以“踵事增华”、“变本加厉”的文学发展眼光加以考察。《文选序》云“诗赋体即不一”,即《文选》中有诗、赋等文类之别,又“自姬汉以来,眇焉悠邈,时更七代,数逾千祀”,文体风格历代变迁,又各有不同,如《文选序》所言“物既有之,文亦宜然。随时变改,难可详悉”。《文选序》乃集成以后方作,又因序文体制所限,所论自然不能综括各类文体及其风格,如《序》中所言“序述之错比文华”,并不能综括三篇文风质朴的经籍序,或只偏举其中一类而言之。故考察《文选》的选文标准,亦应分类具体而言,不宜以“沉思翰藻”之类标准等而视之。即“研究《文选》文者,不仅必得驰双轨——既须辨其‘体’,亦要析其‘文’;且当究其变”^②。推言之,研究《文选》之“序”体,亦应以整体观察部分,既作动态的分类考察,又作具体的文本分析。

萧统在《文选序》中表明,其不选子书,是因其“以立意为宗,不以能文为本”。不选“贤人之美辞,忠臣之抗直”等之类的史辞,是因其“概见坟籍,旁出于史……虽传之简牍,而事异篇章”。“贤人之美辞,忠臣之抗直”之类的传统价值,固为萧统所褒扬,然其不取,主要在于“事异篇章”,亦已繁博,故无须再加编辑之功而徒增案牍之劳。而记事纪年的史书主要在于“褒贬是非,纪别异同”,然“方之篇翰,亦已不同”。萧统在《文选序》中反复提出“事异篇章”、“方之篇翰”、“故与夫篇什”等语,表明其选“文”的前提基础在于“篇章”。史辞、史传之类之所以不取,在于其“事异篇章”,即不能独立成篇,故不同于“文学”。而“序述”、“赞论”之类之所以可取,正在于其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,即同于“篇章”的文体独立性及其文学意义,萧统故而“与夫篇什,杂而集之”。

文体独立的表现,首先在于“篇章独立”。我们以此观《文选》所选之九篇独立序文,可以发现其入《选》之前已有“独立成篇”的特征^③。从“序”体独立进程来看,“序”体发源于《毛诗序》,如明人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》云:“序之体,始于《诗》之《大序》。”^④从“序”体流传情况来看,《毛诗序》应为最早独立成篇的序文。汉初《毛诗》有序,大概以附经的形式流传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,《诗经》今文经二十八卷,《毛诗》二十九卷,或以为《毛诗》之序独为一卷^⑤。而毛公作《诂训传》,又将其分置篇首^⑥。东汉之后,《毛诗序》从《毛诗》中独立出来,分篇流传并有专述。据《隋志》著录可知梁有《毛诗序义》二卷(宋通直郎雷次宗撰)、《毛诗序注》一卷(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)、《毛诗序义》七卷(宋孙畅之撰)、《毛诗序义疏》一卷(齐刘瓛等撰)、《毛诗序》一卷(梁陶弘景注)、《毛诗发题序义》一卷(梁武帝撰)等^⑦。其中刘瓛《毛诗序义疏》,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从《经典释文》、《毛诗正义》中辑得两条,即释《毛诗

①朱晓海《〈文选〉所收三篇经学传注序探微》,《中国文论的方与圆——古代文学理论研究(第三十一辑)》,第34—35页。

②李乃龙《文选文研究》,《序》第2页。

③沈玉成先生较早指出“独立成篇”是《文选》选录的前提而非标准,但未作具体论述。参见:沈玉成《〈文选〉的选录标准》,《文学遗产》1984年第2期,第114页。

④吴讷、徐师曾《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42页。

⑤王先谦云:“此盖序别为一卷,故合全经为二十九。”参见: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,第6册,第2916页。

⑥郑玄于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三篇目下笺云:“至毛公为《诂训传》,乃分众篇之义,各置于其篇端云……”参见:毛亨传、郑玄笺、陆德明音义、孔祥军点校《毛诗传笺》,第225页。

⑦魏徵《隋书》,第4册,第916—917页。

序》“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”，“《甘棠》，美召伯也，召伯之教明于南国”^①，可见刘瓛《毛诗序义疏》为专释《毛诗序》而作。上述几种有关《毛诗序》的著作，皆为专释《毛诗序》而独立成书，表明南朝宋、齐、梁之间，《毛诗序》或已独立成篇流传。又，宋周续之《毛诗周氏注》亦包括有《诗序义》，专释《毛诗序》。其后梁武帝《毛诗发题序义》等，也应包括了对《毛诗序》的解释。由上所述可推，东汉以后至梁代时，《毛诗序》逐渐从《毛诗》中分离出来而以单篇形式流传，独立而成为文学经典篇章。故此，萧统选入此文应无太大的疑问。

关于《尚书序》的真伪问题近代多有争论，或以为其与《古文尚书》多出之二十五篇，同出于东晋梅賾之手^②。然观《尚书序》之义，主要论典籍的生成历史及为《尚书》作传之由，其特别指明：“书序，序所以为作者之意，昭然义见，宜相附近，故引之各冠其篇首。定五十八篇既毕……”^③其“引之各冠其篇首”体例，当源于《毛诗》，可知《尚书序》无论真伪，大抵为仿照《毛诗序》而作。而据后代对《尚书序》的注述，亦可见其流传接受程度。东晋徐邈为《尚书序》作注，是最早可知的为《尚书序》作注者。《王函山房辑佚书》辑佚徐邈《古文尚书音》，辑有《尚书序》注一条：“八卦之说谓之八索，音素，苏故切，求也。”^④略见其貌，可知当时人已将《尚书序》视同于经典篇章，具有可独立成篇的可能。而《春秋左氏传序》一开始就与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分行，《晋书·杜预传》云：“（预）既立功之后，从容无事，乃耽思经籍，为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。又参考众家谱第，谓之《释例》……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，世人未之重，唯秘书监挚虞赏之，曰：‘左丘明本为《春秋》作传，而《左传》遂自孤行。《释例》本为《传》设，而所发明何但《左传》，故亦孤行。’”^⑤据《春秋左传正义》说，《春秋左氏传序》原题名不一，或为《春秋序》，或为《左氏传序》，或为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，或为《春秋左氏传序》，而“南人多云此本‘释例序’，后人移之于此，且有题曰‘春秋释例序’，置之《释例》之端”^⑥。可见其序文流传广布南北，故而题名不一，或以为序文原来为《释例》之一部分，又同《毛诗序》一样被置于篇首：“晋宋古本，序在《集解》之端。”^⑦由其题名不一，或置于篇端，或置于文中，可见其相对独立性。据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与杜预同时的西晋太尉刘寔及南朝宋太学博士贺道养，已专为此序作注。东晋徐邈为《五经音训》，又为此序作注。清刘文淇《左传旧疏考正》卷一云：“注《春秋序》者，古皆单行。《隋·经籍志》云：‘刘寔等《集解春秋序》一卷。《春秋序》一卷，贺道养注。《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》一卷，刘炫注。’是则刘注本自单行，唐人引以列《集解》之端耳。”^⑧可知其在晋宋之时或已独立成篇流传。由上可见，《毛诗序》等三篇经籍序虽为附经之作，但因其深具影响力，也因序文与正文相对独立的关系，可独立分篇流传。而且，三篇序文在经学体例上也有前后相承的关系，表明其经学渊源及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，萧统收之，或有这方面的考虑。

由上述考察，可以推测萧统选入三篇经籍序，应有“独立成篇”及其在当时传播影响方面的考虑。从“独立成篇”、“传播影响”两个方面来考察其他非经籍序文，也可发现类似之处。其他六篇序文或为诗赋序，或为文集序，其独立成篇当不是问题。如《三都赋序》为皇甫谧褒扬左思《三都赋》而作，稍后西晋卫权又作《左思三都赋略解》，其序云：“余观《三都》之赋，言不苟华，必经典要，品物殊类，稟之图籍；辞义瑰玮，良可贵也。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……览斯文而慷慨，为之都序。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、中书郎济南刘逵，并以经学洽博，才章美茂，咸皆悦玩，为之训诂……余嘉其文，不能默已，聊借二子之遗忘，又为之《略解》。”^⑨又，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载：“左太冲作《三都赋》初成，时人互有讥訾……思乃询求于皇甫谧。谧见之嗟叹，遂为作叙。于是先相非贰者，莫不敛衽赞述焉。”^⑩又，《文选·三都赋序》李善注引臧荣绪《晋书》曰：“左思作《三都赋》，世人未重。皇甫谧有高名于世，思乃造而示之，谧称善，为其赋序也。”^⑪唐房玄龄《晋书·文苑列传》载：“及赋成，时人未之重。思自以其作不谢班

① 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卷16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201册，第379页。

② 参见清人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卷二《言安国古文学源流真伪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，第133—152页）、卷七《言安国大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本许慎说文序》（第1052—1060页）等考证，此不赘述。

③ 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33页。

④ 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卷16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201册，第190页。

⑤ 房玄龄《晋书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1031—1032页。

⑥ 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页。按：“后人移之于此”，即移为篇章之首。

⑦ 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1页。

⑧ 王先谦《清经解续编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3册，第882页中栏。

⑨ 房玄龄《晋书》，第8册，第2376页。

⑩ 刘义庆著、刘孝标注、余嘉锡笺疏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215—216页。

⑪ 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37页。

张,恐以人废言,安定皇甫谧有高誉,思造而示之。谧称善,为其赋序。张载为注《魏都》,刘逵注《吴蜀》而序之曰……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《略解》……自是之后,盛重于时,文多不载。司空张华见而叹曰:‘班张之流也。使读者尽而有余,久而更新。’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,洛阳为之纸贵。”^①由上可知,左思赋成之后,概因其以征实为主、言不苟华,不为世人所重,后经皇甫谧作序而声名鹊起,其后又经多人赞述而洛阳纸贵,史书皆称之,可见此序文深有影响。《三都赋》与谧序二者分篇流传,至梁代已名满天下,故昭明并收入《文选》,二者彼此相映,可谓相得益彰。又,王融《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》亦为当时人所称,《南齐书·王融传》载:“(永明)九年,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,使融为《曲水诗序》,文藻富丽,当世称之。”^②由此可见,上述序文之所以能入选,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是一个关键因素,而众人的注释及赞述也是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的重要一环。“序”文的文体独立性及其文学意义,能同于“篇什”,则是编入《文选》的前提和基础。

四 《毛诗序》在《文选》序类中的文体意义

《毛诗序》在《文选》序类中,其文体意义亦不可忽视。“序”古又称为“叙”,《尔雅·释诂》云:“叙,绪也。”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引《尔雅》此说后云:“然则举其纲要,若茧之抽绪。孔子为《书》作《序》,为《易》作《序卦》,子夏为《诗》作《序》,故杜亦称《序》,序《春秋》名义、经传体例及己为解之意也。”^③孔子作《书序》、《序卦》之类,在今看来只是片语只言,不成篇章。而题名子夏之《毛诗序》,是最早可以追溯的序文。任昉《文章缘起序》云“六经素有歌、诗、诔、箴、铭之类”^④,引申著录有八十四题,亦列有序体,或视其为六经之流裔。明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》云:“序之体,始于《诗》之《大序》,首言六义,次言《风》《雅》之变,又次言《二南》王化之自。其言次第有序,故谓之序也。”^⑤清邵长蘅(字子湘)评《毛诗序》云:“《文选》托始于子夏,为是圣门文学之贤,实千古论诗之祖也,亦序书之始也。”^⑥因此,谓“序”体起源于《毛诗序》,自有其经学缘由。《文选》以《毛诗序》为序之首,次列《尚书序》及《春秋左氏传序》等,从某种意义上说,亦应有其文体溯源的意义。

在《文选》中“序述”、“赞论”等类之中,“序”类居于其首,而“序”文之中,又将《毛诗序》置于“序”之首,可概见萧统对于文体的分类观念如何。《文选序》云:“凡次文之体,各以汇聚。诗赋体既不一,又以类分;类分之中,各以时代相次。”可知,萧统在《文选》编辑中有“先总后分”的编次观念,即各文类依次汇聚、以类相从,而诗赋又以类相分,以时代相次(各体均如此)。从《文选》目录编次来看,赋、诗、骚相次,应源于文体起源观念。首先,赋源于古诗,如《文选序》云:“古诗之体,今则全取赋名。”而从“赋”歌颂功德的文体意义来看,赋尤近于“颂”,即如《文选序》云:“颂者,所以游扬德业,褒赞成功。”《毛诗故训传》以为“颂”在《诗经》中最古,萧统或相应类推地将赋置于《文选》之首。《文选》诗类主要是五言诗,亦源于古诗,如《文选序》云“自炎汉中叶,厥途渐异……四言五言,区以别矣”。其后又云:“又楚人屈原,含忠履洁……骚人之文,自兹而作。”骚源于屈原,从起源来说最为晚近,故置骚于赋、诗之后,此可视为《诗》类之别脉。同理,《文选》文类如诏、册、令、教、文、表、上书、启、弹事、笺、奏记、书、檄等类,可视为《书》之流裔。对问、设论、辞等,其起于宋玉^⑦,又不类于骚、赋,或可视为骚(楚辞)、赋之旁衍。序、颂、赞、符命、史论、史述赞、论等,本为附经述史之体,而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史官著述盖为其端。其后之文体如连珠、箴、铭、诔、哀等类,起于晚近^⑧,可选者又屈指可数,故昭明置之于末。可知《文选》的编次,或取法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著作之顺序,而寓有赅续经典的意味。

从《文选》中“序述”、“赞论”之类的编次,亦可见其“各以汇聚”、“以类相从”的观念。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中,刘勰将“序述”、“赞论”之类都视为“论体”：“详观论体,条流多品:陈政,则与议说合契;释经,则与传注参体;辨史,则

①房玄龄《晋书》,第8册,第2376—2377页。

②萧子显《南齐书》,中华书局1972年版,第3册,第821页。

③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,第1页。

④任昉著、陈懋仁注《文章缘起》,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,第1页。

⑤吴讷、徐师曾《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》,第42页。

⑥许逸民《清代文学学名著集成》,第5册,222页。

⑦《文心雕龙·杂文》云:“宋玉含才,颇亦负俗,始造对问……自《对问》以后,东方朔效而广之,名为《客难》。托古慰志,疏而有辨。”参见: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254页。

⑧沈约《注制旨连珠表》云:“窃寻连珠之作,始自子云。”即认为连珠源自汉代扬雄。参见: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57,第1039页。《文心雕龙》将连珠与对问、七等并入汉代以来的“杂文”。参见: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193—195页。而箴、铭之类虽言源起于远古,实兴于汉季。参见: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254—256页。

与赞评齐行；铨文，则与叙引共纪。故议者宣言；说者说语；传者转师；注者主解；赞者明意；评者平理；序者次事；引者胤辞；八名区分，一揆宗论。论也者，弥纶群言，而研精一理者也。”^①在上述表述中，刘勰把“释经”之“传注”一类以及“铨文”之“叙引”一类都归为“论”体，以为“论如析薪，贵能破理”^②。其中刘勰特别把“述圣通经”作为“论家之正体”：“至石渠论艺，白虎通讲；聚述圣言通经，论家之正体也。”^③又将《毛诗诂训传》等注释一类归为“解散”之“论体”，如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云：“若夫注释为词，解散论体，杂文虽异，总会是同；若秦延君之注《尧典》，十余万字；朱普之解《尚书》，三十万言；所以通人恶烦，羞学章句。若毛公之训《诗》，安国之传《书》，郑君之释《礼》，王弼之解《易》，要约明畅，可为式矣。”^④可见，刘勰将本为经籍传注类的《毛诗序》、《尚书序》等视为“论”——不是说“序”就是“论”，而是认为部分“序”甚有“论”味。《毛诗序》等三篇经籍序本为述经之作，又可独立成篇，当然可视为“解散”之“论体”。故刘勰将释经“传注”类中的序文与铨文之序归为“论”体，并总其特点为“弥纶群言，而研精一理也”，可见当时人们已视两者为近同——当然，亦限于近同。而萧统把“序述”、“赞论”等“各以汇聚”、“以类相从”，又在“序”类中将经籍序与文集序以次相从，亦可谓渊源有自矣。

刘勰“序者次事”观念亦源于儒家思想。“序者次事”，即“序”主要内容为“次事”，即按事物特征或事件规律，依次陈述事物，从而彰显之所以为“序”的理论方法，并由此探求其序背后所蕴藏的思想意义。“序者次事”一类或由事发论，或寓理于事，故亦可称为“论”。儒家传统历来重视“实事求是”，“是”即“事理”，是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规律的有机统一，而诠释“事理”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在历史事实的陈述中排列其次序以直观地呈现，也就是说，中国传统之“道”的阐释模式一般为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而非抽象的阐释。故孔子曰：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^⑤司马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是最早的史传类序文，其序引述此言又推而广之，把《诗》三百篇等视为圣贤发愤之作，认为其“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”^⑥。所谓“述往事、思来者”，即通过叙述“往事”以阐明“道理”，冀其有益于后来人也。故“实事求是”、“以事言理”实为自孔子以来儒家学问的途径方法。故此，后代亦认为有关学问的“序”文应“善叙事理”，如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》引东莱（吕祖谦）之语云：“凡序文籍，当序作者之意，如赠送燕集等作，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。”并认为：“序事之文，以次第其语、善叙事理为上。”^⑦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认为“序”体有二：“一曰议论，二曰叙事”^⑧。萧统亦有以己序作“论”者，如《文选序》中所云“尝试而论之曰……”，其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之言，“事”与“义”并举，亦寓有“言理”即“议论”之意。由此考察《文选》所收序文，其中多篇序文特别是三篇经籍序尤重“事”、“义”，尤近于“论”。如《毛诗序》论“诗言志”、“风雅”之义，深具文学理论意义（详前），被推为“千古论诗之祖”。而《尚书序》主要论典籍的生成历史：“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”^⑨此亦为《文选序》直接征引。《尚书序》又云：“书序，序所以为作者之意。”^⑩亦有论述序体之义。《春秋左氏传序》则论《春秋》述作之由，发明《春秋》义例：“故发传之体有三，而为例之情有五。一曰微而显……二曰志而晦……三曰婉而成章……四曰尽而不污……五曰惩恶而劝善……推此五体以寻经、传，触类而长之，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，王道之正，人伦之纪备矣。”^⑪其他序文亦有论，如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论赋体之源流，可视为文体论：“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。然则赋也者，所以因物造端，敷弘体理，欲人不能加也。引而申之，故文必极美；触类而长之，故辞必尽丽……周监二代，文质之体，百世可知。故孔子采万国之风，正雅颂之名，集而谓之《诗》。诗人之作，杂有赋体。子夏序《诗》曰：一曰风，二曰赋。故知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^⑫故刘师培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云：“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、左思《三都赋序》、卫权《三都序略解序》、

①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326—327页。

②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328页。

③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327页。按：此句各本多有不同，如詹锳《文心雕龙义证》作：“至石渠论艺，白虎讲聚，述圣通经……”参见：詹锳《文心雕龙义证》中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674页。

④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328页。

⑤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1959版，第10册，第3297页。

⑥司马迁《史记》，第10册，第3300页。

⑦吴讷、徐师曾《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》，第42页。

⑧吴讷、徐师曾《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》，第135页。

⑨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31页。

⑩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33页。

⑪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35页。

⑫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37—2038页。

刘逵《蜀都吴都赋注序》，推论赋体之起源，与汉儒“铺陈”之训，宛为符合。”^①陆士衡《豪士赋序》则引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老子》等经典之义以敷畅成文，深得六经之旨。其开篇即云“夫立德之基有常，而建功之路不一”，“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，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”^②，然后以古代圣贤之事以证之，指出“豪士”必识天道时势，功成引退，故能全身远害，所谓“节弥效而德弥广，身逾逸而名逾劭”^③。而任昉《王文宪集序》在于品评人物，既记叙其人，又因之发论：“公在物斯厚，居身以约。玩好绝于耳目，布素表于造次。”“公乘理照物，动必研机。当时嗟服，若有神道。岂非希世之隽民，瑚琏之宏器？”^④等等，可知萧统《文选》所收序文，“事义”先于“文辞”，“沉思”先于“翰藻”，近乎《文选序》所云之“论”者。因“序”与“论”相近，故皆有“守正”之要求，即亦应“征圣”、“宗经”，持守儒家“正道”思想。

由上所述，亦可见魏晋以来士人崇尚讲论风气亦流及文体。刘师培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论宋齐梁陈文学特征之一为“士崇讲论，而语悉成章也”^⑤。魏晋时期士人擅长清谈，而“晋宋之际，宗炳之伦，承其流风，兼以施于讲学。宋则谢灵运、瞻之属，并以才辩辞义相高，王惠精言清理……迄于梁代，世主尤崇讲学，国学诸生，惟以辩论儒玄为务，或发题申难，往复循环，具详《南史》各传。用是讲论之词，自成条贯，及笔之于书，则为讲疏、口义、笔对，大抵辨析名理，既极精微，而属词有序，质而有文，为魏、晋以来所未有。当时人士，既习其风，故析理之文，议礼之作，迄于陈季，多有可观，则亦士崇讲论之效也。”^⑥梁代士人讲论风气尤盛，萧氏父子亦崇讲论之风，如梁武帝常与人辩论，沈约《武帝集序》称其“善发谈端，精于持论，置垒难逾，推锋莫拟”^⑦，其作《五经讲疏》、《毛诗发题序义》等应属于讲论一类，其概“以辩论儒玄为务”，亦具有“辨析名理，既极精微”的论说特点。而昭明、简文年幼即已登堂讲经，二人于经学皆有所成，亦可谓是“经学洽博”的学者，当受经学讲论风气的影响。故萧统将《毛诗序》等序文与“论”相类，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“论”体的认知和推崇。

五 结语

综上，萧统编《文选》当深受家族著述传统影响，其选入《毛诗序》并于《文选序》中直接称述其语，不但因该序在经学上处于重要地位，也因其序体上的首创意义及其深具的文学理论意义。与此同时，是序还“独立成篇”而“单行”。据此可推知《文选》编纂应受《毛诗序》诗学思想的影响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有云：“盖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，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。若乃论文叙笔，则固别区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。”^⑧以此观昭明《文选》的编次体例，其将赋、诗、骚等各文类依次汇聚、以类相从，或取法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著作之顺序，寓有赅续经典的意味，也体现出一定的“征圣”、“宗经”思想。其中“序述”、“赞论”之类文体，“各以汇聚”又“以类相从”，体现出“缘起条贯”^⑨、取类经典的特点，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昭明亦具有《文心雕龙》“原始以表末”所彰显的文学发展观念及文体溯源的意识。考察《文选》所录三篇经籍及其他序文，可知所收多为久负盛名的独立篇章，表明昭明深具“篇什独立”的文学文体意识，体现出其在选文上“动态”地对待不同文类的独特选编思想。综观《文选》“序”类所收序文，其“事义”、“沉思”先于“文辞”、“翰藻”，有近于“论”体者，于当时“文学”深有影响，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“论”体的认知和推崇。故昭明之《文选》，在某种程度上亦体现了类似《文心雕龙》“选文定篇”、“敷理以举统”的学术思想。因此，或可以说，《文选》收录《毛诗序》，更多源于萧统内心思想的自觉及其清醒的文体意识，而非受外力因素的影响。

[责任编辑：唐 普]

①刘师培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，程千帆等导读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71页。

②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43页。

③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47页。

④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，第5册，第2081、2082—2083页。

⑤刘师培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，第98页。

⑥刘师培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，第99页。按：引文中“谢灵运”之“运”，原误作“远”。

⑦欧阳询撰、汪绍楹校《艺文类聚》，第269页。

⑧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727页。

⑨郭殿忱、陈劲松《论〈文选〉之序体》，《北华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3年第1期，第26页。